

孙从添藏书思想特色论略

马 欣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孙从添是我国清代著名藏书家,其依据历代藏书家以及自身藏书经验所著的《藏书纪要》一书,对我国古代藏书管理实践方法进行了较全面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孙从添的藏书思想主要有四方面的特色:以“致用”为宗旨的藏书思想、对藏书管理人员专业素养的高要求、关于藏书与读书的审美情趣、对藏书与读书的“好古”情结。

[关键词]孙从添 藏书思想 《藏书纪要》

[分类号]G259.29

孙从添是我国清代著名藏书家,其著作《藏书纪要》作为我国19世纪唯一一部系统介绍图书典籍收藏管理技术及理论的书籍,让孙从添在中国藏书史上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功绩^[1]。关于孙从添藏书思想的评述与研究始于黄丕烈,《藏书纪要》一书首次刊刻于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黄丕烈在跋语中评价其“言之甚详且备,盖亦真知笃好者”^[2]。清末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评价《藏书纪要》一书“所记皆甘苦之言,益人见识不少”^[3]。叶德辉更是在《藏书纪要》的基础上撰写出《藏书十约》^[4]。综合来看,清代藏书家及学者对孙从添藏书思想颇予赞赏。随着藏书事业的发展,后来藏书家也提出了一些对孙从添藏书思想进行补充或改进的观点,但他们对于孙从添藏书思想的认可度仍是相当高的。现代学者关于孙从添藏书思想的讨论多集中于他的藏书管理技术,如陈少川对孙从添的图书编目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5];梁城对孙从添藏书楼建筑与藏书环境的观念进行了评述^[6];谢灼华对孙从添其人及其书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并对其藏书管理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7]。迄今,关于孙从添藏书思想的研究成果颇多,但目前仍未有专门研究孙从添藏书思想中个人特色的成果。笔者基于孙从添本人著作以及已有成果对其藏书思想中的特色进行分析和评价,旨在对孙从添藏书思想的研究进行一定的拾遗补缺。

1 以“致用”为宗旨的藏书思想

1.1 “利济学术”之文献价值观

文献价值,是文献这一客体以其属性来满足人的特定需要的关系中产生和显示出来的某种意义或有用性^[8]。文献价值并非文献本身的客观属性,而是人们在文献基础上建立的主观认识,这种主观认识与个人需求层次与范围

有关,因此文献价值常因人而异^[8]。孙从添的整体文献价值观在其《藏书纪要·购求》一节中表现无遗,如其所言“故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也,人心之善恶,世道之得失,莫不辨于是焉。天下惟读书之人,而后能修身,而后能治国也,是书者又人身中之至宝也”。可见孙从添认为书籍是“天下至宝”“人身至宝”,而惟读书方能辨人心世道、修身治国,这种观点表明,文献价值的体现主要在于“读”而非文献本身。孙从添在《藏书纪要·抄录》一节中也有同一思想的表达,即“书之所以贵抄录者,以其便于诵读也”。文献价值既反映在个人对文献整体态度上,同时也表现在对待某类或某种文献上,即部分文献价值。孙从添的部分文献价值在《藏书纪要·鉴别》中阐述得非常具体,他认为不同主题的文献各有其不同的价值,如述古、文词、翰苑、经济之文、小学、韵学、山经、地志、游览、技艺、养生、博物、种植、岁时、医卜、九流、杂技之书等,各有各的价值。对不同主题文献价值的判断,其前提是鉴别有方,这就有点“慧眼识珠”的意味,单设《鉴别》一章,就是为了强调鉴别书籍的重要性。显然,孙从添所强调的鉴别,主要指图书内容价值的鉴别,而非图书外在形态(如装帧、纸张等)的鉴别。按照孙从添的观点,各类主题之书各有其价值,无论何类文献,只要“利济学术”便有其收藏和阅读的价值。

1.2 “得者宝之”之文献流通观

我国古代书籍流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官方垄断、抄写传播和印刷传播3个阶段,至宋代雕版印刷技术成熟之后,书籍生产速度提高,促进了书籍的市场流通^[9]。书籍的生产与流通到了清代已相当普遍,但宋元及以前的古籍文献因多次“书厄”而损毁严重,鉴于古籍文献的珍贵与易散等原因,清代藏书家们对所藏书籍的流通观各不相同。孙从添对书籍的获得与流转持有十分豁达开放的心态,他在

《藏书纪要·购求》中写道:“以人身之至宝而我独得之,又不至埋没于尘土之中,抛弃于庸夫之室,岂非人世间一大美事乎。”可见,对于书籍的获得,孙从添认为是一个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书籍的美事,于己可以收获阅读与收藏等价值,于书籍则得到了保护。在孙从添藏书中,除盖有私章外还有一印“得者宝之”(得到此书的人请将它当作珍宝之物对待),可见孙从添清楚地知道个人所藏书籍不能永久保存,而他希望所藏书籍在流转他人手中时能够被重视与保护,这就是他的文献流通观。在这种文献流通观念下,孙从添在《藏书纪要·编目》中提出了书籍借阅规则:如有人取阅借抄,即填明书目上,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借,或取阅,一月一查取讨原书,即入原柜,销去前注,借者更要留心,若一月不还,当使催归原柜,不致遗失。这也是我国较早的关于图书借阅制度的记录,其中不仅包括借阅信息的记录,还包括借阅时间规定以及催还原则,已相当详细具体,其目的就是为了加速书籍流通,充分实现每一部书的阅读价值。

1.3 “曝书会”之文献交流观

曝书活动在汉唐时期已成风俗,唐徐坚《初学记》卷四引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曲,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10]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11]至两宋时期,曝书活动已在官府藏书乃至私家藏书中普及开来,并出现专门的曝书会。北宋钱穆父《和阁老舍人曝书会》诗记述了当时馆阁曝书的盛景:“天禄图书府,芸签岁曝频。幡经穷藏室,赐会集儒绅。顾陆高标好,钟王妙入神。可无丹槧吏,来预石渠宾。”可见,当时的曝书活动除了保护书籍这一目的之外,还成为学人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集会。

曝书会这种文献交流模式是孙从添所向往与提倡的,他在《藏书纪要·曝书》中言:“汉唐时有曝书会,后鲜有继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之效法前人也。”由此可见,孙从添的藏书思想非藏而不用,反而是希望能够与同好共享文献资源,进行学术交流。这一观念在《藏书纪要·校勘》一章中也有所体现,孙从添认为:“校书非数名士相好,聚于名园读书处,讲究讨论寻绎旧文,方可有成,否则终有不到之处。”总结孙从添所提及的文献交流包括以下三种:人与文献的交流(即阅读)、以文献为中介的人与人交流(即学术交流)、文献与文献的交流(即校勘、抄写等藏书管理工作)。曝书会是一种能够有效实现文献交流的活动,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孙从添的开放的文献交流思想。孙从添如此开放的文献交流观在古代藏书家中并非普遍存在,与宁波范钦等藏书家严格的藏书管理与保护制度对比鲜明。两种观念不能以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评判,

范钦天一阁保守的文献交流观使其所藏文献得以保存至今,孙从添开放的文献交流观使文献的内容价值能够得到有效利用与发展,二者对当今古籍管理工作在“藏”“用”之间的平衡均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 对藏书管理人员专业素养的高要求

2.1 采购人员

我国古代私家藏书的采购人员通常就是藏书家自己,而我国古代藏书家大部分都是封建官僚,属于“士”阶层人士,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因而我国古代藏书采购人员的专业素养普遍较高。孙从添对书籍采购人员的专业素养要求是相当高的,从《藏书纪要·购求》以及《藏书纪要·鉴别》两章中大致可以总结出其对书籍采购人员的三个基本专业素质要求。其一,书籍采购人员要对古今书籍有深入而广泛的认识,不仅“识古本今本之书籍”,还需要“道其源流,辨原版翻版之不同者,知某书之久不刷印,某书之只有抄本者”,如此便需要采购人员有精熟的书籍版本知识和相应的文化水平,这与普通商品采购人员的要求大不相同。其二,书籍采购人员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须“眼力精熟,考究确切”,同时还要阅读“各家收藏目录、历朝书目、类书总目、读书志、敏求记、经籍考、志书、文苑志、书籍志、二十一史经籍志”等文献,然后才有可能收集到各地的善本、秘本。其三,书籍采购人员应勤于采访,勤于搜集书籍市场上的相关信息,能够“搜之于书佣,购求之于旧家,知近求,知远购”,并做到“鉴识真伪,检点卷数,辩论字纸”,而非“贸贸购求”。

2.2 校讎人员

孙从添认为书籍校讎人员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博学好古、勤于看书、时间充裕。孙从添认为具备以上三个必要条件则可以开始从事校讎工作,校讎一事非“庸常之人”可以做好的事情,唯有“勤学好问,隐居君子,方能为之”。实际上“博学”是校讎人员的一个基本素养,校讎人员需要掌握文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经传诸子亦为必读书,同时还需了解史学、目录学、金石学等^[12];而“好古”“勤奋”“隐居”三者才是孙从添对校讎人员所做出的特别要求,即热爱校讎工作,并且能够投入大量时间从事校讎工作。同时,孙从添认为校讎工作最好是团队完成,多个校讎人员共同从事同一校讎,方能尽量避免错误。对此,他在《藏书纪要·校讎》中提道:“校书非数名士相好,聚于名园读书处,讲究讨论寻绎旧文,方可有成,否则终有不到之处。”从事校正刊刻工作的人则需要“博雅君子,有力而好古者”,书籍上版工作则要“名手校正,方可刊刻,不然枉费刻资”,如此才能“不遗误后人”,使书籍得以高质量地保存与流传。

2.3 编目人员

编目是使书籍得以有效利用的重要工具,无论是我国古代藏书管理还是现代图书馆管理都需要专业人员进行编目工作。孙从添认为“藏书四库编目最难”,其原因在于编目人员需要具备相当高的专业素养。在孙从添看来,编目人员须具备的专业素养主要有三:其一,编目人员需明于典籍,甚至“非明于典籍者不能为之”,要求编目人员对其编目对象有着全面深入的认识。其二,善于编目者应当做到“检阅清楚,门类分晰,有条有理”,编目成果方能“不致错混颠倒,遗漏草率”,要求编目人员有较强的分门别类之能力。其三,目录管理工作需要“诚实君子”来担任,以保证目录保存与使用过程中的“无弊”,对编目人员的道德品质提出了高标准要求。

3 关于藏书与读书的审美情趣

3.1 文献的“形式美”与“内容美”

古籍文献通常在具有内容价值的同时也具有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我国古代藏书家对古籍文献的不同价值往往持不同观点,孙从添则是一位既重视古籍文献价值,又重视古籍的文物与艺术价值的藏书家。在其《藏书纪要》中对文献的艺术价值提出了较多的个人观点,可大致将这些观点分为文献的“形式美”与“内容美”两方面,其中关于文献“形式美”的描述颇多。在《藏书纪要·鉴别》中,孙从添提出“宋刻之妙”在于“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可以看出他对纸墨字体有着独特审美,这种审美观可用“雅”字来概括。同时,他还在该章中提出对于古籍“不经圈点者为贵,古人尊重宋刻,弗轻涂抹,后世庸流俗子,不知爱惜书籍,妄自动笔,有始无终,随意圈点,良可叹也”,这种审美观可用“本真”来概括。在《藏书纪要·抄录》中,孙从添还对古籍字迹笔法提出了自己的审美观点,如他所言“常见古人稿本,字随草率,而笔法高雅,纸墨图章色色俱真,自当为稀世之宝”;“前辈抄录书籍,以软宋字小楷颜柳欧字为工,宋刻字更妙,摹宋版字样笔画均匀,不脱落,无遗误,乌丝行款,整齐中带生动,为至精而备美。序跋、图章、画像,摹仿精雅,不可呆板,乃为妙手”;“抄本书画图最难,用白描法,运笔古雅秀劲为主,人物画像要生动,又要清雅而端庄,方为合式”。在《藏书纪要·装订》中,孙从添对古籍文献的整体外形审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装订书籍,不在华美视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大雅,厚薄得宜,精致端庄,方为第一”;“松江黄绿笺纸封面,再加常锦套,金笺贴签,最俗。”可见孙从添对于文献“形式美”的审美在于“精雅端庄”,不喜“华丽俗气”。关于文献的

“内容美”,孙从添主要从“校雠”质量角度立意,认为文献校雠须遵循“还其本原”的原则。为此,他在《藏书纪要·校雠》中指出:“书籍不论抄刻好歹,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在孙从添看来,校书的目的在于“还其本原”,而“还其本原”之书,从内容上说实现了“完璧归赵”,这一“完璧”就给人以“完好无损”之美感。孙从添所言“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其“至宝”一语就是从“还其本原”或“完璧归赵”意义上而言的内容美。

3.2 藏书与阅读的“环境美”

建筑结构、室外环境和室内环境是读者感受审美环境的几个因素,其中室内环境的建设是创造“环境美”的主要方式^[13]。孙从添在《藏书纪要·收藏》中对室内阅读环境中的书柜与书架两个藏书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审美要求。他认为书柜应当“朴素精雅兼备为妙”“请名手集唐句刻于柜门上,用白铜包角装订,不用花纹,以雅为主”;书架应当“雅而精,朴素者佳”。总之,藏书环境应当是“古朴精雅”,使其具有文化氛围。关于阅读“环境美”,孙从添则提出了书桌与气氛两方面要求。孙从添认为书桌应当简洁有序,做到“案头之书,三日一整,方不错乱”。关于阅读气氛的描述则在《藏书纪要·购求》中有专门的描述,其曰:“手烧妙香,口吃苦茶,然后开卷读之,岂非人世间一大韵事乎。”其中“香”与“茶”均是可以提升人类精神世界,带来美的感受的物质,也是我国古代文人墨客的常用之物,孙从添认为以此可以提升阅读过程中的审美感受(“韵事”)。

3.3 文献阅读中的“心灵美”

阅读不仅是一种认知活动,还是一种心理活动,因此阅读通常会给人带来具有差异性的复杂体验,其中就包括“心灵美”这一精神世界得到升华的审美体验^[14]。孙从添的阅读审美观更多的是从追求真理、修身养性之目的上立意。他在《藏书纪要·购求》中就认为“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草昧何异”,能够阅读并从书籍中获取知识来认识世界并提升个人修养,是人与禽兽之间的差异所在;如果没有了书籍与阅读行为,人类与动植物便没有差别。因此,当一个人获得一本心仪之书并进行阅读时,他的求知心理得到了满足,精神世界得到了丰富,同时还有一种“世间至宝而我独得之”的满足感,自然获得了一种极高的“心灵美”的审美感受,正如他自己所言“以此为乐,胜于南面百城多矣”。

4 藏书活动中的“好古”思想

4.1 “经为上”的文献等级观念

清代乾嘉间“实事求是”的考据之风盛行,大批学者投身于考据学研究,而考据之学离不开丰富的藏书,因此许

多清代著名学者同时也是藏书家。在此背景下,清代藏书家的藏书与学术活动十分活跃,有些地域逐渐发展出其特色的藏书文化^[15]。其中,孙从添的家乡常熟就因当地的藏书氛围、出版事业以及学术研究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虞山派”这一藏书文化圈,提倡“善读为善藏”“尊经而好古”等理念。孙从添生活于清代初中期的康乾时期,其藏书活动与藏书思想深受“虞山派”的影响,尤其是“尊经而好古”这一思想,对其影响綦巨。正因如此,孙从添始终坚持“经为上”的文献等级观念。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鉴别》中将其文献等级观念概括为:藏书之道,先分经史子集四种,取其精华,去其糠秕,经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这种“经为上”的文献等级观念在无形中指导孙从添整个藏书思想及其实践,不仅影响其藏书过程中的采购偏好,甚至还会影响文献阅读时的书籍选择与时间安排等。

4.2 推崇宋元刻本、抄本和稿本

以宋元时期的藏书最为珍贵,这几乎是清代藏书家的共识。生活于“虞山派”地区的孙从添也讲究收藏宋元刻本、抄本、稿本^[15]。他在《藏书纪要·鉴别》中提到:“宋刻本书籍,传留至今,已成希世之宝,其未翻刻者及不全者、即翻刻过而又不全者,皆当珍重之,吉光片羽,无不奇珍,岂可轻放哉。”同时,他还在《藏书纪要·编目》中提出应当编制“宋元刻本抄本目录”,且此目录应“另贮一柜,照式行款写之,柜用封锁,不许擅开”。孙从添流传至今的藏书目录《上善堂宋元版精抄旧抄书目》便是他个人对这一理论与思想的实践证明。在《藏书纪要·校勘》一章中,孙从添还提出了理想状态的校勘与藏书,即“惟叶石君所藏书籍,皆手笔校正,临宋本、印宋抄,俱借善本改正,博古好学,称为第一”,仍然强调以宋本宋抄为最优。

5 结语

从现代图书馆学角度出发去研究孙从添的藏书思想特色,我们会发现,在孙从添的藏书思想中,既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又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孙从添“藏以致用”的藏书思想超越了同时代的一些“藏而不用”的藏书家。他的文献价值观、流通观以及交流观可视为现代图书馆理念的“前现代”肇端。孙从添对藏书管理人员素养提出的要求,对现代古籍管理人员培养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孙从添对文献本身的审美,对藏书与阅读环境的美学要求,以及阅读中获得的美学体验,均不讲究奢侈华丽,而是希望在古朴典雅的环境中,燃清香、吃苦茶,在书籍中寻觅知识与真理,获得精神世界的丰富。对书籍、藏书以及阅读的这种审美观照,是孙从添藏书思想有别于其他藏书

家思想的特色所在。至于孙从添的“好古”情结,“尊经”的文献等级观念,推崇宋元本等思想,虽已不适用于当今时代,但这些思想观念在当时却占据主流地位,说明这些思想观念在当时是“先进的”,而不是“落后的”。这就提醒我们,对待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一定要历史地看问题,不能简单地以“先进”或“落后”的标签去臆断其优劣。

参考文献:

- [1] 刘刘青.孙从添及其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贡献[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1):31-36.
- [2] 黄丕烈.藏书纪要·跋[M]//孙从添.藏书纪要.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 [3] 谢灼华.孙庆增其人及其书[J].图书馆学通讯,1986(4):77-87.
- [4] 叶德辉.藏书十约·序[M]//祁承燾,等.藏书记.扬州:广陵书社,2010.
- [5] 陈少川.孙从添的图书编目理论浅析[J].晋图学刊,1989(4):54-57.
- [6] 梁城.孙从添藏书度库建筑思想述略[J].甘肃档案,1984(6):31-32.
- [7] 杨晓骏.论文献价值[J].图书馆学研究,1999(4):19-22.
- [8] 贺巷超.文献价值观初论[J].图书情报知识,1992(3):4-6.
- [9] 花家明.文化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古代书籍的流通形式[J].图书馆论坛,2007(2):178-181.
- [10] (唐)徐坚,等.初学记[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1]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12]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2001.
- [13] 张彬.图书馆空间的审美化与阅读环境设计[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5):28-38.
- [14] 王欣欣.阅读的本质与图书馆服务[J].图书馆论坛,2006(2):69-71,141.
- [15] 胡松庆,曹培根.虞山派藏书家的藏书思想及学术成就[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2(2):45-48.

马欣女,1991年生。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收稿日期:2023-07-03;责编:姜明辉。)